

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文史资料来稿登记表

收稿时间	收稿编号	撰稿人	来稿单位	字数
81年9月14日	42	朱其超		8000
作 者 通 讯 地 址	昆山南城河岸9号			
作者简介				
来稿题目	烽火记忆坎坷			
原分类编号		现分类编号	03	
主要内容	<p>记述1937年至1945年作者在宜兴地区教书、为出信而奔波、宣传抗日思想而招当地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以及一再失业的情况。</p>			
处理意见	<p>存案。但决价价不大。 省办 收102 12/12/81</p>			
转送单位		转送日期	年 月 日	
备 考	处理结果			
	稿酬金额		2.10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委员会常委委员负责同志，转
江苏省文史资料编辑部负责同志：

我是江苏省昆山中学退休老教师，今年七十一岁。我在各地当了三十年的中学教师。

去年、前年我先后在我县《文笔》刊物上发表过两篇回忆录，其斗争史实俱系发生于当地的，并由县广播站为之广播。自中央新闻出版法公布以后，我县刊物已停办。

我在三十年代初期，——1933年这一年里，在母校复旦大学教育学会曾参加我们党的外围组织：左翼教师联盟（即：教联），进行了反“围剿”的地下斗争。关于这一阶段的真实史料，我把它写成回忆录，已参照解放日报编辑部的建议寄往上海市文史资料编辑部，供采用刊出。

1937年8.13——45年8.15这八年里，我是在宜兴县张渚南山一带地区度过了坎坷不平的生活的。关于这一阶段的真实史料，我把它写成回忆录，借此追忆逝世的战士、怀念健在的同志，从历史意义来看，它不但是我个人际遇的真实纪录的一页，同时也是那个特定年代国统区真实面貌的一角！——我以《烽火年代中坎坷》为总名，写成了较多字数的资料，并特付邮寄上，请为保存备用！

办此。顺致

敬礼！

朱其超



1981.9.11.

（通信处：昆山南城河岸9号）

烽火年代忆坎坷 朱其超

1937年8月13日，抗日战争在上海爆发，至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整整八易寒暑的烽火年代，我与爱人和孩子们是在宜兴县张渚南山一带地区度过的。我在那里还是当教师，有时为地方报社义务写稿。但，当年的“粉笔生涯”这个“饭碗”是毫无保障的，何况日本鬼子要来侵扰，国统区的军队要来迫害，而反动党团员教师和学生在其主子作耳目，于是失业、祸患、既阻不安、颠沛流离……让我们在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上度过了这烽火年代。

38年10月中旬，我从山区石屑芥立邀前经设立在张渚的中学补习班当国文、历史教师，就在11月下旬，有两位从陕北公学结业返回上海市工作的同志，途经张渚，在我校借宿两夜，他们赠送抗日战争歌曲集，我抄录了首页的《国歌》，又选取了由学校翻印的一些抗战歌曲汇订成册；在12月下旬，另有陆军新编第四军政治部的王一同志来校借宿三夜，转往《宜兴报》社暂住半个月，再返回部队去，《宜兴报》曾连日刊出由他供稿关于新四军的打击日本鬼子的报导，他把三十多本盖有政治部公章的书籍赠送给报社里的同志们和我校的个别教师，我选取了《抗日民族统

《战线》《全民政治》《论青年的修养》等三本。

39年2月，学校扩充成三个班级，正式定名为宜兴县立中学张渚分部，我除原任科目外，兼授地理、公民课。我打开公民课本一看，什么“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我在讲课时给这些内容作了逐条批判，加以一一否定了，于是我翻印了选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资料题目《抗日史料选》，又照本翻印了张闻天同志著的《论青年的修养》作为两份补充教材，分发给全校学生阅读，并作为我讲课时的依据。

那时，宜兴县城区由日本鬼子和汉奸们设立了伪政权机构，只控制着县境东北几个乡镇，而张渚地处西南，是国统区的县级机关所在地，统治着县境三分之二的区域。《宜兴》报在名义上是宜兴县政府介绍人员开办的，每月发给一些津贴费，对于日常工作倒是不问不闻的。原编辑人员程潜刚离去以后，由吕爱生一人支撑一些日子，接着，偕以民来当编辑，后来，汪大可和他的爱人刘冠群一同来增强了阵容。《宜兴》报先后改名为《宜兴日报》《苏南日报》《阵中报》《战斗报》，我在这五种报刊上都发表过文章。39年6月下旬，偕者以民来校向我索取《抗日史料选》一册，即在《苏南日报》上连续刊出。他曾悄悄地向我说：“国民党军队五十

二师政训处人员来提出“中止发表”，但，我们坚持把它全部刊出了！”

《抗日史料选》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共中央从提出倡议到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过，中共中央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历程等的真实史料。这是与国统区一般报刊上所鼓吹的一套胡言乱语，却毫无相同之处的。因此，也难怪国民党军队五十二师的政训处人员要来提出“中止发表”了。当年，报社里的工作人员：吕爱生、储以民、任大可是宜兴人，孙冠群是南京人，他们都是地下党的同志。他们把报社迁往飞鲤村去以后，还在就近的五洞桥小镇上开设了一个杂货小店，作为往来同志们的连络站。在皖南事变发生不久，他们都去参加新四军了。

1939年7月7日上午，在张渚当地的驻军机关人员学校师生假座老戏院举行七·七“两周年”纪念大会，日本鬼子的三架轰炸机突然飞来张渚上空作多次盘旋后，在公路旁边投下了三枚炸弹，因未被发现目标，这次空袭无人伤亡。但，为了适应防空的需要，学校宣布一、二年级学生在下学期开学时补行学期考试，三年级毕业班学生迁至柏山庙宇内继续上复习课，并举行毕业考试。我在毕业班授最后一课时向学生说：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只有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领袖人物必然是毛泽东和朱德等。

7月中旬的一天中午，毕业班的学生都离去了，学校照例在学期终了时要邀集全体教职员聚餐一次的，我听得有两个国民党教员教师吕步池、胡福成拉开了笑脸，一吹一唱，异口同声地向我说：“今天应该请朱先生坐首位。”我发觉他们话中有话，原来有一条惯例：凡是被解聘的人员，在一次临别前的聚餐席上应该是坐首位的，表示送出校门去了。而学校负责人余仁善在比以前，并没有向我作过书面或口头的辞聘表示，我的被解聘当然是已经确定了。倘若再证诸平时向学生讲课时的言论，我与他们三人是针锋相对的，那末，我的被无辜解聘也是意料中之事。我遭受了失业，于是退居到山区石骨界去。

(注：吕步池，1940年冬，他到国统区的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去当主任科员；胡福成，1940年秋，他到国统区的后方去当国民党的专员；余仁善，1943年冬，他去充当汉奸教育科长。)

40年8月，我得自母校复旦大学章益老师经辗转通信介绍，前往设立在山区胥井的江苏省立第五临时中学当高中普通科地理及师范科民众教育、教育心理学教师，同时

由教务处推荐去兼授开办在邻近的私立念的中学高中同教材的地理课。一天课余时间，念的中学一个学生程琴拿来话，他悄悄地向我说：我在张清读书的时候就是您的学生。现在，这里的三青团员学生正在注意到您的言论。我希望您在讲课时要谨慎一些！”与此同时，在第五临时中学，我多次发现校长顾敦福在走廊里信步徘徊，他是在探听我的讲课内容。可是，我在这两所学校里，只讲课本内容，不谈补充资料，他们对我徒然注意，空劳探听，而是无所收获”的。

41年1月，第五临时中学的校长顾敦福辞职，由原任国统区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科长的童致旋接任校长，在尚未到任之前，他委托新任教务主任先向我们作口头发表“留任原职”，但在2月份开学前夕，我尚未接得报到通知书，我去向这个教务主任交涉时，他面红耳赤地支吾其辞，把责任推卸到童致旋身上（注：后来我听说是在过去张清期间的那个国民党员教师吕步池在江南行署里向走马上任之前的童致旋进言解聘我的），于是我又一次遇到了失业。

失业，又失业怎么办？41年2月，在胥井邻近的民望桥增设江苏省立第四临时小学民望分校，由学校负责人热情邀我到毕业班去当临时代课教师。这学期里，江苏省立

第五临时中学的学生闹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学潮，散发传单，揭露了学校当局的种种贪污勾当。对于这件事，隔了好久，我听得人家传说之后才知道的。于是到学期终了时，校长董政庭灰溜溜地呈请辞职，退回到那尔江南行署去当秘书了，其家属还是居住在胥井的，而这所中学从此却迁移到安徽和溪去继续开办了。与此同时，江苏省立第四临时小学的校长也呈请辞职，另有人员来接替了。

41年8月—42年1月，我的爱人在江苏省立第四临时小学当教师，我又赋闲在家了。我们的一儿大男孩在学期开始时患了恶性瘧疾，置身山区，医药不便，贫病交迫，因循坐误，在农历七月二十九日逝世，年仅四岁又二月。42年2月，江苏省立第四临时小学民望分校撤销，恢复了宜兴县立民望小学，由当地学生家长推荐我的爱人当校长；我早出晚归，到三里路程以外的北川小学去开办升学补习班，北川小学两个教师宗达臣（宜兴人）、周毓时（无锡人）在江苏省立第五临时中学师范科读书时期都是我的学生。4月24日下午，周毓时从张渚搬运行李到校，在途经大涧小镇时，却被国民党统治区的江苏省保安第四中队稽查处人员从她的行李中搜查到了新四军同志写给她的信件，于是把她扣押了起来，宗大臣来通知我：“他们指明要你亲

自去其保，才能释放她。”我当然义不容辞地去保释了她。然而，一次灾难性的祸患竟然降临我的头上来了！

4月25日下午，保安第四纵队的政训处三个人员先后两次闯进北川小学里来，都是不打一声招呼，东张西望，就鬼鬼祟祟地离去了。26日傍晚，我正走在从北川返回民望界的路，忽然看见一个民望小学的寄宿学生河新伯气喘吁吁地在迎面跑来，他拉住我的衣袖，阻止我的步行，急促地向我说：“先生，你不能回到民望界去了！现在保安第四纵队的十几个兵正在抄你的家，一面在屋门前架起了步枪，一面在房间里到处搜查。他们说您有什么共产党嫌疑。您还是到别处去避开一下吧！”我说：“我除了教书以外，并没有干过别的什么事情，我怕什么呢？我不用躲避他们的！”于是我和他一同返回到民望界去了。

我走进房东贾镜宅——我们的寓所——家门，保安第四纵队政训处的一个人员傲慢地向我狞笑着说：“你来了，我们正要找你。在这本抗战歌曲集的首页是抄写的《国际歌》，是不是你自己抄写的？”我说：“是的，正是我自己亲手抄写的。”另一个满脸横肉的人员说：“你跟我们走！”我的爱人手里抱着一个孩子站在旁边，却被他逼着她连同孩子和我一道走。我们被押送进民望界的贾家祠堂里去，那里已被保安第四

纵队占用为一个「大队部」的办公室了，我们就在那里坐在板凳上熬过了一个夜晚。27日早上，那个大队长杜仁培（姓兴）走进办公室里来向我说：「我们大队部接到纵队指挥部的通知：听得人家说你是C、P分子，派来了政训处的人员进行查究。我们大队部只是奉命照办，请你们来这里委屈了一下。现在，你们都可以回去了。我来向你们设席道歉！」我们回到寓所去，房东老太太告诉我说：「昨天晚上，他们再来抄家，把你们的東西全部都仔细搜查过了，连马桶也不例外。但，听得他们在说：「什么也没有搜查到。」

（注：1948年秋，我在《新蜀报》上看到：在宜宾县西北境内，国民党反动军队「击毙投降共军的杜仁培」。他的晚节是好的！）

这天，我吃过早饭，就照常到北川小学的开学补习班去上课了。可是，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保安第四纵队指挥部派了政训处的一个人员会同荷枪实弹的两个兵来到学校的办公室却又把我押走了，这回是把我押送到设在胥井的指挥部政训处去，一会儿我的爱人和孩子也被他们押送来了，傍晚，经当地的学生家长具保，母子俩总算得到释放的，我一个人就从这个傍晚起被封闭在他们的大营房——临时监狱里，四周都是床铺，住满了官和兵，却在潮湿的

泥地上堆放着一张薄芦席，叫我夜晚睡在这上面，白天蹲在这上面，三餐吃的是些残余饭菜，每次大小便由一个兵携枪紧跟看守着。我的双手是经常被反绑着的，我只有在就寝后或一日三餐及大小便时，在一个兵的看守下，才得单绑一只手。我意识到他们因为没有脚镣手铐的刑具，所以才用麻绳来绑住我的手的，为的是防止我越狱逃跑吧。看来他们是把我当做头号“政治犯”对待了！

我先后被他们审问过五次，其中有一次还被用刑拷打。27日当天的深夜，大约十点半钟，指挥部的参谋处来提审，那个参谋长沈霞飞说：你是南山一带地区的共产党领袖。你经常到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太极洞里去主持召开秘密会议。我说：我每天都在忙着上课，晚上批改作业，哪会有空工夫去开什么会？太极洞在东南西北，我还不知道哩。

28日的深夜，大约十一点钟，又是参谋处来提审了。沈霞飞说：你在宜兴县立中学张渚分部的课堂里向学生宣传共产党的理论，要使多少个青年学生在思想上中了你的毒。你还编印过历史讲义，也是为共产党作宣传。我说：你们把这些证据搬出来吧！”他说：这个地区，日本人打进来过了实物证据一时找不到，当时的学生也已分散在各地，但还是会有学生传说出来的。我说：你们只根据道听涂说，

有什么理由可以来逮捕呢？”他又说：你抄写的《国际歌》，就是共产党的证据。”我说这《国际歌》，只是一种过去的歌曲，并没有听说过只有共产党在流传，禁止外界人抄写。”

29日的夜晚，大约才到九点钟，他们就来提审我了，地点是在姓董的一家人家，他们设立了三个所谓案桌，中间坐着参谋长沈霞飞，左边是军法官汤XX，右边是政训主任张刑法，布置成“三堂会审”的模样。那个军法官说：你知道吗？你的同党任保朴已经被逮捕了，他在口供里招出了你是他的同党，你们是在一起活动的。”我说：过去我到宜兴县立中学张浩分部里来玩，我是看见过他的。但，他现在何处，干啥事，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们说我是同他在一起活动的，那就把他找来对证吧！”他说：你别嘴壳，看你留着长头发，天天在山区跑来跑去，就不是个好东西！”我说：从民望岭到北川，相距三里路，我每天早出晚归，总是要跑来跑去的；头发留得长一些，这与好东西或坏东西有什么关系呢？”他说：你还要嘴壳。警卫兵，揍他一下！”于是，一个兵便站在我面前向我左右开弓了，打了我左边一记耳光，又打了我右边一记耳光。我被打得满脸肿胀，头脑震动，两耳发响，但，我仍然很镇静。

（注：任保朴，即：任伯达同志，宜兴人。1944年冬

听说他在南山地区任宜兴县县长，张之宜同志任苏浙皖边区政府专员。1949年暑期，我在无锡学习时，张之宜同志任苏南人民政府公署秘书，承他告知：“任伯达已病逝。吕爰生在行军途中病逝，任大可在渡船翻沉时逝世。”
 又注：孙冠群现在山东省工作；储以民现在江西省工作。）

那个政训主任接着说：“江苏省立第五临时中学的学潮就是你煽动起来的。你们共产党是幕后策划者。”我说：“我对于那次学潮的内幕，直到现在还是不清楚。既是共产党煽动起来的，那实在抱歉得很，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因此，那次学潮，确实是与我毫不相干的！”这时，那个军法官突然插嘴说：“你还在嘴壳。”警卫兵，把他放到老虎凳上去，用刑！”于是两个兵前来把我拖到他们自己临时杜造的土刑具上去，所谓老虎凳，只是用一条长凳绑上一些绳子，便于把人绑住行刑罢了。一个兵拉我两手平摊在凳面上，另一个兵用两块叠扎紧的毛竹板狠狠地打了我的左手掌两记、右手掌一记，“十指连心”，我当时感觉到十分疼痛，好像双手已被砍去似的。我定神昂视，发现那个江南行署秘书童致旋的老婆正在旁边喃喃自语，指指点点哩。

（注：当时，我的左手受伤甚至，现在遇上阴雨天还会感到隐隐疼痛的。）

那个参谋长也开口了：张口声声说自己不是共产党，与共产党无关，我们立即可以把证人找来的。警卫兵，把周婉时带上来！接着，他说：“周婉时，你说一说吧。”于是周婉时吞吞吐吐地说了：他是我的老师。我对他的过去并不清楚。只听得同学之间的传说，过去他在别的学校里教书时，是与共产党有过关系的。”那个参谋长等待周婉时说完，便吆喝着警卫兵，外边的泥潭挖好了没有？我们抓到共产党，不枪毙，就活埋！”但，我猜想这只是一种种恐吓，群众旁听的有三十多人，周婉时说了这样几句空空洞洞的话，怎么可以把她当做什么人证呢？一会儿，那个参谋长却改口说了：暂时不作处决，改日再行审问。”这次三堂会审，算是告一段落了。

30日的深夜，大约十一点钟，军法处来提审，那个军法官说：“我们奉命再来审问你一下，你把怎样煽动江苏省立第五临时中学的学潮详细地说一遍。”我说：“我根本不清楚这次学潮的内幕情况，我什么也无从说起。”他说：“不肯说，我们也会知道。现在章毅旋秘书长家里还保存着当时的传单。”我说：“我在那个时期，白天忙于上课，夜晚忙于批改作业，我哪会有空闲工夫出去煽动学潮呢？再说，我的一举一动，同事们都可以给我证明的，是经过你们

去调查清楚的。当我退出军法处的时候，听得里边有人在招呼：“董秘书，请坐！”这次的提审，很明显正是这个董教唆在幕后指使着的。

5月1日傍晚，参谋处再一次来提审，那个参谋长问我：“你有什么话要想说吗？”我说：“什么也没有！”他说：“我们已经决定，要把你押解到江南行署去。如果你要半途逃跑的话，我们是格杀不议的。老实说，我们是杀人不见眼的！”

5月3日上午9时左右，我照常在临时监狱里席地而坐，忽然有五位学生家长出现在我的面前了，我觉得很奇怪。那位贾伯伯开口说话了：“我们是各山村的学生家长代表，有三十多位学生家长联名把你具保释放了。我们承担随传随到的责任。现在请你同我们一起到参谋处去告辞一声，我们就可以伴送你回到家里去了。”这时参谋处的传令员也来了，他解开了我双手上的麻绳，带领我们六人一同到参谋处去。但，见了那个参谋长，我混不开口，又不表态，我面对暴徒，目中无人了。贾伯伯也只说了三言两语，他们一行人便伴送我返回民望界去了。

保安第四纵队指挥部参谋处原已决定把我押解到江南行署去。我如被押解去的话，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只有活的去，没有活的回，向例如此，我必将被无辜杀害了。

然而，怎么会急转直下，竟然让我交保释放，死里逃生的呢？我的爱人向我说明了底细：“三十多名的学生家长联名保书早已送去了，他们根本不予理睬，哪里会考虑到释放的问题。我的父亲和三叔去敦请了一位原在军队里当过高级官儿，现在张清经商过着富裕生活的大人物，在5月2日早上，他去向保安第四纵队的指挥官张少华及其下属什么参谋长、军法官、政训主任等指责了一番，并嘱咐他们不要引起当地公愤，还是早些将你交保释放吧！至于我们要花费一些在清客上，那当然是免不了的。”

国统区的保安第四纵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军队呢？我后来才逐渐了解到：这个纵队原名江苏省保安第九旅，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常州人，在苏北时被我们的新四军打击得溃不成军了，他们撤退到张清来补充和整休，接着，便改名为江苏省保安第四纵队。所谓指挥官张少华（常州人）原是在太湖里杀人越货的强盗头子，他搜罗了同伙，纠合成一支队伍，国民党省政权把他们接收了；所谓参谋长沈露心（常州人）原是在苏北国统区的军队里鬼混的，被张少华看中重用了；所谓政训主任张彤法（常州人）原是在苏北国统区里当过县长的，失去了地盘，归附了张少华；所谓军法官汤××（常州人）原在胥井的念的中学里当过历史教师的，因有同

乡之缓，也给张少华拔效了。

这个军队自从驻扎在张渚一带地区以后，他们干了些什么样的坏事呢？强征苛捐杂税，强征粮食燃料，强征树木毛竹，强占民房，强拉民夫，强抢少女……但，其中最惨无人道的勾当是，从上海市或其他地区前往延安或国统区后方的青年人，随带行李钱财，途经张渚要道，他们每于深夜在三里外的樱洞村，把这些青年人悄悄地杀害了，谋财害命，还要给以毁灭灭迹。他们对于老百姓是杀人不论眼的。但，日本鬼子远在三十里外，只是听到了轰隆炮声，他们就要作好向后转的逃命准备了。如果风闻日本鬼子真的要侵扰到张渚来了，那末，他们早已在三天前逃跑得无影无踪了。他们是什么样的部队呢？他们是国统区里一支典型的祸国殃民的土匪部队！

(注：解放以后，1951年秋，《新华日报》先后刊载，匪首张少华及张彤法，由常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又注：汤××，不知下落；沈霞飞，在解放前夕，从昆山率领霞光匪众仓惶逃走，不知去向。)

5月中旬，我迁离民望界至前巷村岳家小住。8月下旬，我应老同事朱元休之邀，前往宜兴县立第一中学西校当国文、地理教师。43年2月，校名改为私立善卷中学，

偏偏又遇上了那个童致璇却来此校接任校长了，于是我又被解聘了，再次遭受失业。8月，我得于北海介绍，前往正在筹办中的江苏省立第一临时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当教师，但，10月中旬，日本鬼子来侵扰，把这所学校在长岗镇择定的校舍（祠堂房屋）放火烧毁，学校停办了。我与爱人和孩子们又退居到4区的石屑界了。这回，日本鬼子却在张渚屯兵驻守，作长期赖着不走的打靶，于是张渚也宣告沦陷了。原在山区或乡区设立的中学，师生分散都停办了，新在张渚开办的中学，由汉奸余仁善兼任校长。

1945年8月中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终于获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即将转入了另一个阶段。但，在那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里，失业、祸患、既阻不安颠沛流离……并不是我个人独有的经历，一定会有不少与我际遇近似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吧。然而，当年的坎坷不平的生活内容，今天我还是值得来回味一下的，借此追忆逝世的战士，怀念在世的同志，从历史意义来看，它不只是我个人际遇真实纪录的一页，而同时也是那个特定年代国统区真实面貌的一角哩！